

西樵山：近世广东史之景观象征

——读《南海县志·序》有感

北京大学历史系 赵世瑜

关于珠江三角洲的历史和地理，学界、特别是广东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近年来，社会史与人类学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所做工作，使我们对这一地区自明代以来的历史有了超越以往的更清晰的认识。特别是通过这些研究，“华南研究”在中国的区域历史研究中“率先垂范”，其他区域的研究也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开展起来，所以对于中国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者来说，无论是到广东还是到福建来，并不意味着他或她对这些地区有多少真知灼见，而是带有“朝圣”的意味。我相信，在以后的学术史旅行中，这个意味会越来越重的。

我本人对华南任何地区素无研究，当然也很少读关于广东的文献。当然在珠江三角洲以及广东的其他地区，无论是沿海还是山区，还是跑过一二十次，多少有点感性认识。我以前没到过西樵山，但也久闻其名，近世史上第一家民族企业继昌隆缫丝厂是写进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没有理由不知道，这就是西樵的。不过知道点常识并不足以让我产生一点新的看法，只好去读《南海县志》——因为西

樵当年是属于南海县的，算是读了一点最基础的广东文献，虽然比信口开河好一点，但基本上也是一些鄙陋之见。

一

如果算上宋淳祐《南海志》和元大德的《南海志》——因为那时的“南海”与明清时期的南海县还是有点不同的政区概念，明代有两部《南海县志》，清代有五部，此外还有《南海乡土志》和《九江乡志》，起码有十几部与南海有关的志书，还不算各个版本的《广州府志》在内，真可以算是大富豪。有这么多方志的地方，做研究太幸运。因为如果有这么多方志，其他地方文献之丰富就可以想见。

先说康熙志。^① 在本序之外，康熙志对旧序的安排很有意思，最前面是崇祯志的序，然后是万历志的序，再下面是宋淳祐《南海志》的序，最后是元大德《南海志》的序，真是想不通编者为什么这样安排顺序，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研究，有没有什么解释。大体是由近及远，厚今薄古，但元志又在宋志的后面。总之，编者似乎是不按照时序排列的。

排在最前面的四篇明代序的作者显然心怀不满，因为里面的文字不是抱怨就是不满，说赋役很重，浮粮很多，盗贼蜂起，人心不古。崇祯志序作者、南海知县朱光熙的牢骚最多：“窃见南邑之民力日耗而民气日蹙。夫民力日耗而用民之力者殊无醉饱之期，气日蹙而揉民之气者自处于三鼓之竭，焉望其生计顿苏、醇风旋复耶？……今日耗力之端多矣，且不具论。论其甚者，则有定弓一项。盖自军兴加赋，小民亦知事非得已，第以虚税作正供，稔时犹堪勉强，如昨年

① 本文引用的康熙《南海县志》系（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

西潦决堤,民皆鱼鳖,即额征几乎难之,而犹责偿虚税,将问之逃亡屋乎!”后面的牢骚如滔滔江水,全都是攻击领导和现实政策的言论。

跟在后面的是本地人庞景忠写的,也是崇祯志的序,他也参加过万历志的编写,基本上是配合着朱知县的口气。他前面还不咸不淡地说了几句场面话,随后口风一转,说“惟是井里雕耗,闾阎瘠苦,征调日繁,输輓弗继。军兴中外,履亩加赋,而吾邑犹苦定弓虚额,望新生移抵,如俟河清,民益重困。且也剽掠横行于海上,桴鼓弥满于山谷。……”最后说我们这些小民也没什么办法,只好靠君子出来保佑我们平安吧。

崇祯年间全国陷于战乱和灾害,日子确实不好过。但对于崇祯年间的广州来说,战火还没烧过来,比北方各地日子好过多了。万历时期是明朝最繁荣的时期,但万历志说什么呢?作者也是南海知县,他说“余入南海之初,则见采樵旁午,井陌萧条,讼狱繁兴,风俗凌轹”。到宋元两志的序,说了点好话,也就被置于最后。所以,康熙志的编者似乎是以说坏话的程度如何排序的,而且绝不满足于腹诽,直接通过地方志把不满情绪发泄出来了。

其实,在很多时候,说坏话等于说实话,说好话则是说假话。康熙志编者的司马昭之心,其实不难猜测,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前朝的末世一定是很糟糕的,否则怎么会本朝所代替?这是个合法性的问题。宋、元与大清是隔代了,没有直接的关系,多说点好话也没关系。实际上,宋淳祐《南海志》序夸奖了这里的山海风物,但说到这里的文化,还是不敢吹牛皮,说这里“仕进者鲜”;元大德《南海志》序讲得更有意思,说“南海荒远,在图中一黑志耳”,之所以还要关注这个地方,主要是考虑到版籍的问题,否

则就一边玩去。

其实珠江三角洲的社会经济真正有点起色还是在明代中叶以后,但到晚明,地方士绅、甚至地方官府对中央政府日益不满,所以在地方志里牢骚满腹。但这种牢骚和宋元时人的蔑视大大地不同,这种牢骚相当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那些银行家对贵族的牢骚——我们自己在里面搞得好好地,却要被你们这些北方的家伙敲诈,所以民怨沸腾。这些“民”其实主要是知识精英。所以到康熙志的序里,这种情绪依然延续,因为满洲人不仅更“北”,而且更“蛮”,哪里比得上“海滨邹鲁”,更何况经历了南明的“皇帝化”的洗礼。所以,康熙志序的第一篇,南海知县胡云客写的,还是客客气气,说我们这里明代出了许多的名人,放在最前面摆样子;第二篇姓郭的前任知县的序中心是说,南海虽然貌似物产丰富,但实际上民力非常艰难;第三篇是本地的士绅梁佩兰写的,那就完全不客气了,他上来就说孔子表扬的良史董狐是秉笔直书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在这里说一些不着四六的客气话,说“今者簿书期会而外,虽头如蓬葆,手足如抵胼,奔走迎送而不暇给,民亦疲于供应,无如之何。又昔强藩在境,以予邑为富饶,正赋既供,而犹取办于士马刍茭、齿革羽毛之属,较倍他邑”。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本届政府的工作重心就是催科(“国家以催科为殿最,令欲其自见其功名,势不能不重催科也”),所以百姓才疲于奔命,整篇序就讲这一点。

为什么这种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原因是从明代中叶开始,这里的人们腰包鼓起来了,所以对收税之类的事是最讨厌的。腰包瘪瘪的时候是不会骂中央的,骂可骂不来困难补贴。那时候宁愿中央来收税,因为这是成为编户齐民的必要代价。等到妾身已明,身家渐丰,那个时候再骂就无碍了,国家还要放下身段来乞求财政支援。

到最后,这个国家就彻底变成了地方的对立面。明末全国打仗,全国加税,清初也是战时财政,广东也不能幸免,大家都不满意,但《南海县志》却敢于公然流露。所以这几篇方志的序,与其说是历史的真实反映,不如说是借机造势。

这差不多就是近世的广东史。

二

无独有偶。正是康熙志正式肯定了西樵山的地位。在卷一“舆地志”中,编者回顾了“羊城八景”的历史沿革,在宋、元、明三朝的“八景”中,都不见西樵的踪影,只是到了这时,也就是清初的“八景”中,才有了“西樵云瀑”的说法。在胡序中提到,“灵州、石门、西樵,皆名山也,亦各图之,使灿然简册”,可石门山在宋、元的八景中就占有一席之地了,不是西樵可以比的。

为什么西樵到清初名声大振?这要归功于明中叶广东的文化振兴,近世广东史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在康熙志《山川》部分里,关于石门山的描述只是寥寥数行,元代的西华寺到明嘉靖间也毁了。但西樵山的部分却是蔚然大观,原因在于霍韬、王弘海、方献夫、陈白沙、湛若水等等都与它发生了关系。在这一时期,西樵山里兴建了云谷书院、端州书院、大科书院、石泉书院、四峰书院,其中云谷和大科是湛若水建的,石泉是方献夫建的,四峰是霍韬建的。与城里标榜宋儒学问的濂溪书院、晦翁书院的正统相比,这里俨然已是新兴的广东学术的发源地(参见康熙志卷8《学校》)。

湛若水、方献夫和霍韬这个小圈子可以说是西樵山结成的。方献夫在正德年间请病假回家休养,霍韬也是在此时借结婚隐居西樵,他们与湛若水“卜筑西樵,往来讲学”,此后就发生了“大礼仪”,

西樵或许就成为了“议礼”的理论基础的奠定之地。方献夫乞休之后又回到西樵,“治第西樵山麓,悠游十载而卒”,他的文集也起名为《西樵存稿》。霍韬的家族墓地也在西樵,父亲的墓表和母亲的神道碑都是湛若水写的。此外,方、霍二人与王阳明也惺惺相惜。稍晚又有何维柏,中进士前“尝慕西樵泉石之胜,负笈读书其中,时湛文简、霍文敏亦山栖,与语多所默契”。晚年聚众讲学,“发明白沙之旨”(同上卷11《人物》)。所以,在学理上偏于心性之学、在治道上强调事功的这几个人——不知道是否可以称为明中叶的“广东学派”——都与西樵山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上的几个人,通常被放到思想史的脉络中加以讨论和定位,事实上,他们与明嘉靖后政治史上的变化有极大关联,反过来,他们又影响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结构,并因此对其后的广东史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已为一些学者申论,无须赘言。由于我愿意将明嘉靖时期视为近世广东史的起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西樵山确可被视为这段历史的景观象征。

三

几乎是同时,西樵山发生的另外一些事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约在弘治、正德年间,广东监察御史屠应坤向朝廷上疏,请求禁止西樵等地的大规模采石活动(康熙志卷14《奏议》)。按照屈大均后来的认识,西樵各峰的石头,无论是石质还是颜色,都各有不同,有的可作石柱及柱础,有的可作碑材、砚台,有的可作墙围,有的可作炉台,不一而足(《广东新语》卷5《石语·西樵石》)。起初采石的只有三五十人,“后遂凿得铁矿”,逐渐就聚集起三五千;起初都是“近山顽民”,后来则是“四方有罪亡命者多归之矣”。佛山本来就

是民间冶铁和陶瓷业的中心,这时又发现了新的资源,造就了冶铁业和建材业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于公于私,这件事都是有利可图的,由于《明实录》于此无载,所以暂不清楚屠应坤的建议是否得到批准,但多半是无疾而终。因为在石湾《霍氏崇本堂族谱》中,还有规定“不可去入窑砌砖,去挑砖入窑,及去西樵山抬石,番禺等处入穴挑煤”,“不可去佛山学习炒铁出铁,制造铁锅,打铁器,打铜锣等项”,等等(《石湾霍氏崇本堂族谱》卷3《工有百艺之当做》),说明这已成为当地重要的谋生手段。

许多下层民众聚在这里,当然会有他们自己的文化需求。屠应坤说,他“惟闻矿场赛愿,聚师巫,降邪神,夜聚饮酒,猖狂而已”。这种情况,似乎与前面对西樵山的知识精英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这两种文化并不必然形成冲突,也许恰恰是这样的商业氛围影响了湛若水、霍韬们的事功观念,更不必说他们在西樵的私宅以及在老家的祠堂极可能就是用了这里的石材。从近世广东史的角度说,这一侧面同样证明了西樵山的景观象征意义。

四

西樵山的景观全貌,率先出现在康熙志中,那里开始有了《西樵山图》,不过与道光编、同治续的《南海县志》之《西樵山图》比,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两相对比,前者不出山水地图的窠臼,后者已明显采用西法,位置、距离、比例都比较准确。更为重要的是,前者基本上被定位为名胜图,而后者却被定位为区划图。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后者的前后各图都是南海县下辖各村堡的地图,不过,又不像各堡要征粮。它并不是真正的行政区划,但却“被区划”了。为什么会

这样定位?那一定是这里的自然区隔以及人为活动日益有了相对独立的特点,而这个变化也一定是自明中叶发生,到清代继续强化,并为人所意识到的。



康熙《南海县志》西樵山图



同治续修《南海县志》西樵山图

这个变化是什么呢?明中叶那几位乡贤早已成仙,后人不会只因为当年有几个名人在那里讲学聊天就分出行政区划来的。不过

·西樵山:近世广东史之景观象征·

看看地图,我们就知道这个变化是与这里的开发分不开的。

西樵是广州以南距海最近的一道隆起,西江与北江在其南北。西江北是为九江堡,即在西樵的正北,西樵则为九江的凭依,前后扼守了如今崖南这个出海口。古人就已知道西樵山是从海里冒出来的,山前的这片土地也是逐渐、逐渐地冲积而成,所谓“两江泥沙附山而淳,渐淳渐广,山之距水亦渐远,于是始有田”。所以北宋以来就以堤围之,成为我们要考察的桑基鱼田。这个开发过程不断向西江下游延伸,也就是在顺德、香山、新会的下游淤出来的田越多,江水河道变窄,向南海的泄水量大受限制,就造成上游地区洪水泛滥,冲毁农田,西樵以南数十里称为“桑园围”的地方便频遭伤害(同治续志卷12《金石略二》,阮元《新建南海县桑园围石堤碑记》)。

西樵虽是山区,但因风景如画,背山面水,成为开发山前桑园的大族的风水龙脉。除了霍韬家族把墓地置于此外,此后也有多人效尤。如大桐堡规岗乡的陈显忠在顺治时致仕回乡,“仍捐祭田二十亩,买置西樵山义冢十余亩,以惠宗族”。沙头堡人邓士宪也是在道光年间在西樵山麓“架屋十余区,以庇族人之露居野处者”(同上卷13《列传》)。关于清代西樵以南的沙田开发、宗族建设、士绅活动等等与西樵山地区的关系,仅仅靠地方志中的只言片语是无法说清的,也不是我之力所能及。但无论如何,从这个角度去审视西樵山在近世广东史上的景观象征意义,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地图中的“绝对空间”与“相对空间”

——以清末南海县西樵山图为例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吴滔

现代地图学成立最重要的基础在于具有统一的比例尺,这背后所对应的制图理念是空间可以平等地被对待,也就是说空间必须具有“客观性”。这种与地图有关的空间“客观性”的知识,一方面来自西方源远流长的欧几里得几何学传统,另一方面则建立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人类对于地理知识日渐全面的理解之上。伴随着这一进程,以经纬度为坐标把各项地理要素定位于“绝对位置”的现代地图,逐渐取代侧重相对位置表达的传统地图,成为人类表达空间关系和叙述空间事件最主要的方式。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学东渐大潮的强烈冲击之下,传统中国的地图绘制方法也不再游离于以上进程,曾经最为流行的山水画法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经纬度实测地图渐渐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即使在这一“巨变”中,中国古代另一种制图方法“计里画方”法仍不断寻机与西式绘图法一较高下。本文将以前代特别是晚清时代西樵山地区不同种类的地图为例,揭示中国近代地图绘制中从侧重“相对空间”到逐渐接受“绝对空间”表达的历程。